

的編者

浙江仇教事件勢令中國宗教政策崩潰

浙江省政府自二零一三年厲行「三改一拆」（即舊住宅區改造、舊廠區改造、城中村改造及拆除違法建築）政策，意想不到自今年三月起演變成針對基督宗教的拆除十字架風潮，在不少地方甚至是整座教堂受到清拆，當中又以享有「中國的耶路撒冷」美譽的溫州市，受創尤深。

對比起來，基督新教信友團體所受的傷害遠遠超過天主教群體，但天主教所受的創痛也絕非輕微。大家都在守護教堂及守護十字架的過程中受盡肉身及心靈上的折磨，肢體嚴重受傷以致要送往各地醫院的，為數不少，令人見而心傷。

這從二月開始一直持續升溫的浙江省仇教事件，有很多問題值得我們加以反省及細心思考。首先，我們很憂慮這「仇教事件」是中央的立場抑或地方當局個別主事官員的主張？到目前為止仍未看到中央對事件表態，可見暫時仍是地方政府的行動，甚至是國家宗教事務局的旗艦刊物《中國宗教》，在二零一四年四月號仍以「封底專頁」重點介紹「溫州基督教會柳市堂」；由此可見中國在當時尚未意識到溫州以至浙江省發生了嚴重的變故。但我們不可忽略，清拆十字架的行動在省方面是相當高層次的；中央一直未有制止，無論是出於任何原因，這樣的發展有機會演變成中央為了面子而勉強為浙江省政府背書，而導致其他省份互相效尤，對教會的傷害就會更加嚴重了。

今次「事件」中，天主教受害相對輕微，完全是因為天主教的發展停滯不前，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筆者初次到訪溫州時，當地天主教徒約有七至十萬人，與基督教方面人數相約。時至今天，

天主教仍只是大約有十一或十二萬人，但基督教早已增長至超過一百萬。（有稱實數應為一百二十五萬）因此，我們未有受到政府當局特別注意，是因為不幸地：我們的傳福音工作停滯不前。

也許有人認為教會（包括天主教和基督教）發展過速，引來當局的注意而招致「殺身之禍」。然而，我們從來未有聽聞當局對教會發展的限制。再者，即使當局有所限制，莫非我們就要因為人的要求，而放棄基督給我們的福傳使命嗎？有人以為「溫州事件」是衝著地下教會而來的政治風波，但今次的事件實際上是衝著公開教會而來。天主教的溫州教區主教朱維芳在「告溫州教區全體神父、教友書」可見一斑。（請參閱本刊今期第四十八頁。）

在海內外多方呼籲及抗爭之下，清拆風潮似乎在八月份暫時收斂了；但在原定的「三改一拆」三年計劃餘下歲月是否會有太平日子，尚未可知。不過可以肯定的是，教堂拆了，總要重建；弟兄姊妹受傷退下火線的，後繼者總要補上；傳福音的工作受阻礙，總要重新上路；傷心過後，按照基督的教訓，總要寬恕。總結來說，「浙江省」事件給教會的打擊雖是沉重，但卻是短暫的。

然而，事件對中國政府的影響，卻嚴重及深遠得多。中國政府自改革開放以來，以一九八二年的「十九號文件」為基礎所推行的宗教政策，勢必面臨崩潰；影響所及，就是西藏及新疆地區的宗教界溫和人士，全面失去言論的依托，即使他們願意和政府合作，但肯定受到下層的反彈；而政府即使施以高壓手腕，不過是驅使更多人走向地下化。因此，今次溫州事件，使基督宗教受害甚大，但中國國內的開明人士，受害更大，中國社會的動盪勢必加劇，一方的當權者濫用權力，全國為他們的莽行而受苦。中華大地，求主垂憐。

林瑞琪 二零一四年九月八日 書於香港聖神研究中心